侯方域传体文“私人叙事”特征析论

李三卫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古代史传文学在叙事风貌上可分为“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两种形态,前者以群体抽象为基础,追求主题意义的高远,后者以个体经验为支撑,追求情感记忆的真切。明末清初,面对时代巨变,以文存史的观念促进了传记文的创作繁荣,整体上呈现出“宏大叙事”的倾向。但是侯方域的传体文却能独树一帜,无论是传主选择,还是主题内容,都呈现出鲜明的“私人叙事”特征。探究其成因,与侯方域的成长环境和个人性情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侯方域;传体文;宏大叙事;私人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20)04-0055-05

侯方域(1618—1655),是清初著名才子,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祖位至通显,立身方正,在士林有很好的名声。方域少有才名,青年时结交当世名人,备受称誉,清初宋荦编选《国朝三家文钞》,将其与魏禧、汪琬并称为清初古文创作的“三大家”。而且在“古文三大家”中,侯方域当时的名声俨然凌驾于其余二人之上,“当时论古文,率推方域为第一,远近无异词”^[1]196。

中国自古史学意识发达,传记文创作发轫于《史记》,不仅在之后成为官方史书的标准体例,而且激发了后世文人学者的创作热情。“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2]10,传记文虽然主要承担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不过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文人学士之作往往体现出“私人叙事”的倾向。

这里需要解释两个概念——“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3]在《先秦叙事学研究》一书中,傅修延进一步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定义: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与“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是一一对立统一的叙事范畴,题材重大、风格宏伟的史诗以及许

多类似的官方记事应该属于“宏大叙事”,而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记事无疑属于“私人叙事”。^[4]

如果用这对概念去审视明末清初的传记文创作,会发现在当时的文人学者的创作中,“宏大叙事”这种更多体现在官修正史中的叙事风貌,却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私人叙事”却被挤压到了非常边缘的位置。究其原因,与当时特殊的政治与时代的原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那不断求“大”的时代话语背景当中,侯方域并不算太多的传体文作品却体现出向“私人叙事”的步趋,显得非常独特。

一、明清之际传记文的“宏大叙事”倾向

明清易代对当时士大夫的精神冲击甚大,顾炎武认为当时的情形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这种“亡天下”的可怖局面,促进了明清易代之时传记创作的繁荣。

中国自古相传的“以文存史”传统,一直强调记录兴亡变迁的轨迹,而明清之际纷纷纭纭的忠义奸邪,其沉浮显隐,也需要能够发挥“扬善惩恶”作用的史传文字记载始末,流传后世。所以当时

收稿日期:2020-05-05

作者简介:李三卫(1989—),男,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传记作品创作十分繁荣。一方面,当时出现了数量繁多的私修史书,“几乎清初的士大夫都有明史著作,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长达20卷篇幅,涵容文献千余种,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明史的著述之繁”^{[6]3};另一方面,文人学士创作传记作品的热情高涨,如钱谦益的《钱牧斋全集》为300多人作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思旧录》等作品中有传记上千篇,汪琬集中有传记作品101篇,全祖望文集中传记作品212篇等。^{[6]4}

翻阅当时文人学者的传记文作品,会发现它们在总体上有某种一致性,具体来说,体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传主选择上以忠臣孝子、遗民隐士为主,创作主题以表彰忠孝节义,探讨治乱兴亡为追求。与侯方域并列清初“古文三大家”的魏禧,在自己的《魏叔子文集》当中有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的文人学者对传记文创作的一般看法:“文章之体,万变而不可穷莫如传……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关国家故者,必详书,不敢脱略驰骋、求工于吾文已也,盖以为信史之藉手云尔。于表志也亦然。”^[7]“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关国家故者”强调的是重视有关治乱兴亡的大题目,“盖以为信史之藉手云尔”则表现出要以文存史、补史之阙的目标追求。从《魏叔子文集》来看,魏禧是实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文集中传记文,大部分写的是忠臣、循吏、孝子、烈妇这些“足取法”的人物。除了魏禧,钱谦益也曾自述其传记文创作理念:“苏子瞻之状司马君实曰:‘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谦益犹是志也。”^{[8]687}作为私淑弟子,全祖望在为其师黄宗羲所写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言其“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章尤力”^[9]。这些著名的文人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在传记文创作中承担起探讨兴亡、表彰忠义的大主题,显示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叙述上严守史体,不以呈才使气为工。中国历史上的史传作品,在写作态度上讲求“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唐代史学家在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2]156}明末清初的传记文,因为书写易代之际的大事件,表彰守节殉难的忠臣烈女,题材本身沉重,加上文人学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大追求,使得其时的传记文创作多趋向于严谨、工整、沉实的艺术风貌,正如魏禧所说:“故详密者,史之体也,班氏为正”,只有严正的

史笔,才能与相应的题材和创作目的相配合,“定公案于一时,传信史于来世”^{[8]1244}。与侯方域、魏禧并列“古文三大家”的汪琬也说:“小说家与史家异。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10]他自己所作的传记文,出语审慎,风格雅正,《四库全书总目》即赞其“惟碗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11]1522}。

这些特点,形成了清初散文在总体上向“宏大叙事”的步趋:传记文的写作不再仅仅是以生花妙笔表现传主的独特人生历程,而是努力地负载更宏大的主题,搭建出更广阔视野,生发出更深长的意义。这种“宏大叙事”的趋向,使得明末清初的传记文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了深沉悲慨的艺术风貌,在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创作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这种整体的写作氛围当中,侯方域的传体文却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不断向“私人叙事”步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表达,显得独树一帜。

二、侯方域传体文的“私人叙事”特征

综观侯方域的传记文创作,他既学习前贤如韩愈、柳宗元等人,又能自出机轴,“天才英发,吐气自华,善于规模,绝去蹊径,不戾于古,而亦不泥于今”^{[11]1523},所以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侯方域的传记文在传主选择和叙事旨归上,表现出向“私人叙事”步趋的特点,其叙事的目的,不求延展至天下兴亡的大主题,而是向一家一姓的感受和记忆靠拢,显示出“私人化”写作的倾向。

1. 传主选择上的“舍远求近”。为什么人作传,很能体现作家的传记文创作思想,作家选择的过程,也是贯彻自己的创作理念的过程。侯方域的传记文在传主的选择上,就鲜明地体现出“私人叙事”的倾向:十篇传体文中,记祖父一(《太常公家传》),记叔父一(《司成公家传》),记友朋三(《贾生传》《吴伯裔伯胤传》《徐作霖张渭传》),记祖父之同僚一(《汤御史传》),记父亲之旧将一(《宁南侯传》),记情人一(《李姬传》),记优伶一(《马伶传》),记抗清义士一(《任源邃传》)。除了《马伶传》和《任源邃传》以外,其余的传主,要么是于自己关系亲近之人,要么就是与自己家族关系亲近之人。而《马伶传》写于南京应考期间,故事采自耳闻的一则传说;《任源邃传》的主题虽是表彰忠义,创作缘起则是国变后南游期间友人的委托,所

以即使是这两篇传记的创作,与当时众多的传记作品相比,也有很鲜明的“私人”印记。

2. 审视风云人物的独特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因为其叙事旨归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来。明清易代,体现在传记文的创作中,往往表现为对时局的格外敏感和对家国天下的热切关注,但是在侯方域的传记文中,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旨归。

这一特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宁南侯传》一文中。此文传主左良玉,是当时著名将领,在明末的动荡中,左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时,强兵劲马皆在部下”^{[1]283},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且周旋于崇祯、满清、弘光之间,经历了明清易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传,对于记录明末清初的历史,剖析明亡清兴的形势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本来很容易走向“宏大叙事”,但是侯方域在写作中,却没有按通常人所做的那样去剪裁素材,而是以父亲侯恂对左良玉的知遇之恩和左良玉对侯恂的尊敬感激为主线来结撰全文。此传开头介绍了左良玉犯军法当死,投奔当时在昌平练兵的兵部侍郎侯恂,侯恂惜其才,不以轻贱待之,提拔左良玉带兵去解大凌河之围;接着文章又写了左良玉出征,尚有名无实,侯恂赠字昆山;侯恂被任命为督师,左良玉大喜,派兵五千隆重迎接;朝廷疑忌,撤掉侯恂,以他人代之,左良玉大发怨言,与朝廷更加离心;左良玉驻军九江,欲率部就食南京,赖侯恂去信劝告才作罢。如果与《明史·左良玉传》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这篇传记并不能做到对左良玉其人全面公正的记述,而只是侯方域或者商丘侯氏眼中的左良玉。文章最后归结在对将帅知人善任的感叹中:“然则将苟有材,得其人以御之,虽卒伍可也,而况于公侯哉?”^{[1]284}曲终奏雅,余音袅袅,读者阅文至此,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不会是叱咤睥睨的大将军左良玉,而是仗节军中知人善任、优容人才的侯恂吧。

在此,侯方域实现了将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私人化”书写的目的,这种书写可能没有官方史书记载的那种宏阔视野,但却表现了书写者侯方域个人视域下的历史人物形象。

3. 死难者传记的哀婉凄恻。与明清之际其他文人在写到战乱之中友朋被杀的惨事时,往往奋笔疾书其忠孝壮烈,显得慷慨淋漓不同,侯方域在写到这些自己最亲近的人物时,并没有刻意去夸

大他们在遇害时的凛然正气,而是更多地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去描述命运的残酷,生命的脆弱,从而抒发自己的悲哀之情,又一次展现了侯方域传记向“私人叙事”的步趋。

《吴伯裔伯胤传》写同乡两个友人,两人皆少年英才,吴伯裔“为人沉练英博,慷慨负大志”^{[1]267},而弟弟吴伯胤则“风流文雅,美须眉,善书”^{[1]267},作者认为两人都是经世之才,可惜年纪轻轻就遭遇战乱,死在了乱兵之中,对此,作者自然是惋惜哀伤不已的。传记还特别记述了两人死后,其老父目盲,尚不知儿子的死讯,家人为免其伤心,就让人伪装成吴伯裔和吴伯胤的样子站在老父面前,“父辄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审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归乎!’哭大痛而无泪,不绝声三日,亦死”^{[1]267}。老父亲的悲伤哀苦,让人不禁心颤。

《徐作霖张渭传》则记另外两个有怀才不遇的友人,张渭猖狂,曾以唐太宗时大臣马周自许,徐作霖有经世之才,曾在对策中针对当时的政治举措提出“若崇任苛深,责文法,恐天下乱”^{[1]269}。但是两人也像吴氏兄弟一样,死在了李自成攻破商丘的战乱中。对此,作者哀伤友人的惨死,悲叹命运的无据,在结尾的论赞中尽情倾吐痛苦与惋惜之情:“呜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怀材质者,或不得见用于世,而传之亦异,又足悲也!”^{[1]271}

虽然李自成军与满清军相比,少了民族属性的属性在其中,可是作为灭亡明朝江山的军事力量,明末文人往往以“逆闯”“贼”“寇”之类称呼之,但是侯方域在写作传记的时候,却把视角转向了对友人不幸命运的痛惜,显示出一种在当时比较特殊的“私人叙事”趋向。

三、“私人叙事”的魅力及其形成之因

侯方域传记文的“私人叙事”倾向,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对史料的留存和传记文表现领域的开拓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私人叙事”倾向的成因是耐人寻味的,既与其独特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也与其本人的性情和经历有关。

1. 叙事魅力。首先,素材选取独特,可补正史之阙。因侯方域作传,好选取自己熟悉之人,其所记述,多有独得的材料,因而使自己的传记文有了“补史之阙”的史料价值。侯方域的传记文中,写祖父侯执蒲、叔父侯恪的传记,在素材来源上的得

天独厚自不待言,即使记叙朋友(《吴伯裔伯胤传》《徐作霖张渭传》),记叙情人(《李姬传》),记叙伶人(《马伶传》),也因为接触到了传主本人,对传主性情知之甚悉,所以对其事迹的呈现往往能道他人所不能道,言他人所难以言。即使侯方域本人未曾有过接触的人,也因为传主与自己家族有较亲密的关系,能获知一些他人不易获知的材料。如《汤御史传》的传主汤兆京,侯方域并没有见过,但汤兆京乃是宜兴陈贞慧岳父,陈贞慧与侯方域又为儿女亲家,汤兆京与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又曾同朝为官,所以在记叙汤的一生时,记叙多有所本,一些事迹更是外人不能道。如结尾处写了汤兆京的一件琐事:“有僧达观者,善言佛法,居京师,公卿见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尝取达观所啜水入宫禁,谓之法水。汤公为御史,大怒,捕达观,痛笞之,系狱以死。”^{[1]276}这件事即出自其祖父的亲口讲述,很能表现汤兆京的嫉恶如仇,不避权贵的风范。

其次,视野由大变小,描写细腻生动。因为侯方域的传记文创作不刻意联系家国天下、治乱兴亡的大题目,而关注于时代风云激荡下的个体命运,所以从视野上来说,由大而小,侯方域以此审视传主的生命历程,往往能够以较小的生活琐事,来表现传主的独特风神,取得以小见大、细腻传神的艺术效果。如《司成公家传》记述其叔父侯恪,即紧紧抓住其“嗜饮酒”的癖好,以此点染其生平经历:拒却门人攀附时是“公固闭阁,不与通,日召其故人饮酒”^{[1]252};面对奸人的劝诱,他“大怒,推案起,酒羹覆尔耕衣上淋漓”^{[1]253};被魏忠贤贬逐,离开京师,门人弟子置酒送行都门外时,“公饮酣,遍顾二十三人者曰:‘吾归矣,幸无腆颜以羞诸生,诸生第识之:异日有言诸生为好官者,乃吾弟子也,诚不愿诸生为好官’”^{[1]253};最后因为感愤天下事,纵酒酣饮,因而病逝。好饮酒本是日常生活习惯,作者却天才般地以之与其生平经历、性情品格联系起来,虽然写的都是小事,却生动地表现出传主的独特风神,使其人须眉若现,栩栩如生。

最后,避免道德拔高,形象富于人情味。“宏大叙事”的好处在于使文章的主题向高远处延伸,获得普遍的道德意义,从而使传主的生命经历获得更为广阔的伦理属性,在这种叙事策略的安排下,往往能使传记显得更有历史感和道德神圣感。与之相比,“私人叙事”可以避免“宏大叙事”可能出现的道德拔高,在更贴近生活真实的层面上,塑

造出更贴合生活、更符合人性的传主形象,使人物变得可亲可感,富有人情味。如《宁南侯传》在写到左良玉即将被委以重任时的一件趣事:

即夜遣世威前谕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谕以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1]282}

日后骄横跋扈的大将军竟然也有这般狼狈的往事,让人忍俊不禁,但结合其当时处境,细细想来,又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性的弱点。

2.“私人叙事”倾向的成因。首先,从家庭的环境来说,其父祖辈皆官至高位,历任清显:“祖执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祯间官户部尚书;叔父恪,官大司成”^{[1]1186},且其父祖立身方正,不阿附势焰熏天的阉党,受到迫害后仍不改初志,很得当时士林的赞誉,“风节皆为世所仰重”^{[1]1188}。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侯方域不仅平常能够聆听长辈教诲,其所结交的人物也多是当世英才,所以在传记文的写作中,他在传主选择上并不需要“舍近求远”,因为自己的父祖辈,朋友辈(如徐作霖、张渭),以及与父祖有交往者(如左良玉、汤兆京),都是矫矫不群的英才,为他们作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形成了他在传主选择上的“私人化”倾向。

其次,从个人的经历和性情来说,侯方域是一个交游广阔,且一往情深之人。

明清之际,士大夫极看中名节,士林的舆论对此也极为严苛,一旦出仕清廷,便成为“千夫所指”的衣冠丑类,出处之间的抉择关系到“生前身后名”,所以大多数士大夫都非常慎重。作为一个家世清贵的著名才子,侯方域更是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在顺治八年,当他的父亲侯恂受到清廷的逼迫,非出仕不足以保身的时候,侯方域毅然决然地放下了对名节的坚守,选择了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12],这就是后来备受后人诟病的“晚节不终”一事。不惜葬送名节以护老父周全,由此可见侯方域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侯方域对朋友真挚诚恳,是一个笃于友情的人。在“甲申国变”后,侯方域的朋友或死或隐,渐渐飘零,这让他想起来总觉无限感伤。比如方以智,是他崇祯十二年在南京时结识的一个挚友,国

变后失去音讯,后得知其披缁为僧,马上去信慰勉,这封信写得情深意重,感人泪下,其中一个细节更能见出其对方以智的友情之深:“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指的是方以智赠送的一件衣服)无斃,垢膩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灌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1]564}再如吴应箕,在国变后抗清而死,侯方域为纪念他而写的《祭吴次尾文》悲痛呜咽,让人不忍卒读,其中有言:“然不欲为文者,以未悉授命时本末,恐万一乱真,失吾次尾。今定生乃为我言:次尾战败,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呜呼!今而后,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恚;次尾果死,次尾固在!”^{[1]538}在《商丘县志》里曾记载一件轶事:“顺治初,山东余寇未平,自东南达京师者,皆取道于宋。时计偕年有一孝廉过宋,于近地被盗劫,行不能行,朝宗周其资斧以去。因急鬻一庄,得千金余,遂令僦于宋之四郊。”^{[1]1200}急人之难,仗义疏财,从中可以看出他平素的为人处世中笃于友谊的一面。

正因为侯方域深于友情,深于亲情,所以在写作朋友和亲人的传记时往往更加关注传主的性情才华和个人遭遇;激赏其才华,同情其不幸命运,感慨时代加之于个体生命之重压,也就自然成为了他抒写的主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私人叙事”的

倾向。

[参 考 文 献]

- [1] 侯方域. 侯方域全集校笺[M]. 王树林, 校笺.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 [2] 刘知几. 史通通释[M]. 浦起龙, 通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3] 雷颐. “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J]. 读书, 1997(6): 98.
- [4] 傅修延. 先秦叙事学研究[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107.
- [5]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 集释.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471.
- [6] 俞樟华, 邱江宁. 清代传记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 [7] 魏禧. 魏叔子文集[M]. 胡守仁,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775.
- [8] 钱谦益. 钱牧斋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9] 全祖望. 鮑琦亭文集选注[M]. 黄云眉, 选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109.
- [10] 汪琬. 汪琬全集笺校[M]. 李圣华, 笺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907.
- [11]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2] 谢桂荣, 吴玲. 侯方域年谱简编: 下[J].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73.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Narrative” in Hou Fangyu’ s Biography

Li San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yle, ancient biography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 grand narrative and private narrative. The former pursued the lofty meaning of the theme based on group abstraction, while the latter pursued the sincerity of emotional memory based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times, the concept of “preserving history by literature”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biography literature, which presented the tendency of “grand narrative” on the whole. But Hou Fangyu’ s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yle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fashion of the times, presenting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private narrative” no matter it is the choice of the host or the content of the theme. The causes for Hou Fangyu’ s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tyle might be his unique family growth environment and his own individual disposition.

Key Words: Hou Fangyu; biography; grand narrative; private narrative

(责任编辑: 张晓军)